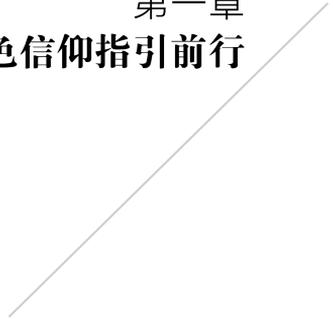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
红色信仰指引前行



“老红军”父亲的特殊党费

程建军

2006年10月,我的父亲程汝善走完了平凡的一生。

父亲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三本20世纪50年代末的党费证和一张特殊的党费证明。每当我看到这些父亲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宝贝时,思绪就会飞到属于父亲的那个年代。

我的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,那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,著名的“黄麻起义”就发生在那里,红四军、红二十八军先后在那里组建。

父亲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,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共和国成立后,父亲返乡务农。1998年,我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。

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,一生忠心耿耿追随党组织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积极交党费。

两个鸡蛋换来的一毛钱党费

大姐曾眼含泪花给我讲父亲交党费的故事。

大姐说:“父亲是全公社最能干的人,最有号召力的共产党员。”这是她儿时对父亲的印象。20世纪50年代,父亲两次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。因此,社员推荐他当乘马岗公社严家榜合作社党支部书记。

大姐说父亲最有资格当这个党支部书记,因为他不仅能干,而且善于找窍门。他自己收集碎砖破瓦盖猪圈,在水塘里种虾草和浮萍当猪饲料,为集体省了不少钱。平常,拾粪、送粪、挑水、浇菜、喂猪,他样样带头。父亲是种水稻、种棉花的行家里手。农忙时节,他经常到公社试验田指导社员防虫、积草肥、整枝打杈,还同社员们一起干活,累病了也不肯休息。社员劝他少劳动多指导的时候,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:“为社会主义多劳动,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幸福,我怎么能光动嘴不动手呢!”

大姐说,三年困难时期,很多地方饿死了人,老家饿死人的家庭也很多。四个孩子的父亲常常为家里没饭吃、没衣穿犯愁,但父亲总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。

没鞋,父亲就到河边割草,晾干后自己编草鞋;买不起布料,他就让母亲纺棉花织土布。家里孩子多,衣裤不够穿,就“接班”向下传,大孩子不能穿了,给小孩子穿,旧了翻新,破了打补丁。

父亲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,导致营养不良。1959年8月的一天,他终于病倒被送到公社卫生所。很多社员去看他。公社干部特批四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,他没舍得吃,让母亲煮了两个分给四个孩子,另外两个送到合作社换了一毛钱交了党费。一些社员不理解父亲,劝他说:“这是公社给的,病成这样了,你应该吃。”父亲说:“吃药打针,公社不收我的钱,这就已经给公社添麻烦了。快到交党费的时候了,一个我和两个鸡蛋正好代表‘100’,我要用自己的百倍努力来回报人民公社,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。”

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。

两斗稻谷换来的 17 元党费

我 1964 年出生,对老家“农业学大寨”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的那些事记忆犹新。

学大寨,公社提出“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”,并派干部到严家榜大队驻队指导修梯田。父亲在严家榜生活五十多年,知道大队下属的七个生产队种的都是陡坡地,修小水田还行,见缝插针多开荒、种旱地也行得通,可把小田变成大梯田根本蓄不住水,不符合实际,劳民伤财,于是在社员大会上带头反对。公社干部见父亲反对,恼羞成怒,硬说父亲“想另搞一套,有修正主义思想倾向”,把他关进学习班“反思”,还批斗他。每次批斗,父亲都被“请”到前面,面对社员群众席地而坐,“聆听”批判教育。好在父亲一向忠厚,与人为善,又是老红军、老党员、老模范,社员群众并没有为难他。不过,交党费却成了问题,原因是公社干部说程汝善改造好了才能交党费。随后的日子里,父亲被安排独自给生产队种树、补修田埂和乡间道路,不得参加集体劳动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修正主义思想,父亲每天早出晚归,修路、种树,一丝不苟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生产有了较大发展,吃穿用也活泛了。到年关,一些家庭可以杀年猪了,很多人家盖了新房。1980年,风调雨顺。由于我家人口多,劳力也多,分到的稻谷比别人家多。那年秋天,父亲挑着两斗稻谷,带我到公社粮站去卖,一共卖了 17.95 元。父亲用 0.95 元买了盐和火柴。返回时,他先到了大队部,找到大队会计,要把余下的

17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。会计很疑惑地劝父亲：“交得太多了。你家里孩子多，用钱的地方多，少交一点儿吧？”父亲不干：“不多不多，我1975年的党费还没交，这次一起补上。孩子一个一个都大了，都能干活，我也能借上力了，明年我还要再多交一点儿。”

一晃，我在部队工作26年了，党龄也有24年了，每次交党费，父亲卖稻谷交党费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每次回麻城老家，我都要走走父亲修过的路，看看父亲当年亲手种的竹林和大树。那片竹林已环绕山村，泡桐、柳树、松树、杉树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。每次看着这些已能遮风挡雨、惠及后人的竹林和大树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抚摸抚摸，抱一抱。我想，父亲是用他的行动告诉我，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，都要不计得失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。

用一生换来的4000元党费

父亲被我接到哈尔滨后，老家的大哥开始代父亲向村支部交党费。

2006年10月22日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，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大会实况直播。起初我很担心他能否坚持看完，没想到父亲非常精神，格外开心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。

10月24日，也就是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，老家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丁科长来电话告诉我，国家民政部通知，给在乡退伍的红军老战士每人发4000元慰问金。病榻上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，开玩笑地跟我说：“这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笔收入，你先替我保存着吧。”

父亲去世前三天，把我和爱人叫到床前，说：“现在你们兄弟姊妹七人的日子都过得很好，把国家给我的4000元补助给你们，你们谁都不会要。老家严家榜村一直想修一座桥，你们就捐给村里修桥吧。”

2008年清明节，我爱人刘静萍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，向麻城市李柱阳副市长转达了父亲的遗愿。李副市长当即表示：“这笔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、老党员用一生换来的，你们就留着吧，村里修桥的经费由市里筹措。市政府今年就能帮你父亲实现这个愿望。”

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，我和爱人没有机会到一线抗震救灾，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灾情。5月20日晚，我们看新闻时同时被一条捐款新闻所吸引——一位老同志对记者讲：“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，我是一名老党员，我要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今年的党费捐给灾区老百姓！”我与爱人相视

一笑,爱人说:“明天我们就去银行把父亲的党费捐给灾区!”

5月21日上午,我和爱人从银行取出这笔钱,连本带息共计4197元,当时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这笔钱能不能作为党费汇到灾区,营业员很为难地告诉我们,没受理过汇党费的业务,办不了。我们又跑了几家银行,都说办不了。最后,我和爱人辗转找到工商银行哈尔滨市革新街支行雷锋储蓄所,简要地向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讲了这笔钱的来历和我们的来意。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肯定地告诉我:“没问题,我们帮你把这笔党费汇到中组部,转到灾区。”

当天,父亲这笔编号为00001号的汇款汇了出去。

后来我了解到,这是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后黑龙江省个人通过银行上交的第一笔特殊党费。

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,是他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,能为父亲交上这笔特殊的党费,我和爱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乐,相信父亲也会含笑九泉。

(整理:张忠宇,2009年5月)

父亲的长征

李曙光

父亲李斌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,14岁跟随贺龙长征。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他那些长征故事,几乎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。

父亲1921年出生于湖南澧县。他十几岁时,因生活所迫,跑到湖北公安县给地主放牛。1935年初,他跑回家乡参加了红二军团,被分到四师十二团一营二连一排三班。战友们都叫他“李伢子”。

连长李明田当天点名时告诉大家,军团长是贺龙,政委是任弼时,政治部主任叫关向应,师长卢东升、团长黄新廷、营长万席真。他让战士们牢牢记住这些人的名字,以防行军作战时与部队失去联系。

1934年,国民党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时,毛主席虽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,但红军采用的还是他的战略战术,所以还是打胜了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,李德那些人控制了军权,抛弃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,开始是冒险主义,打败之后是逃跑主义,以致中央苏区越打越小、粮食紧张、弹药紧缺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险恶形势下,为了避免全军覆没,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,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

左腿被敌机炸伤,坚决不离开部队

1935年初,父亲在黔川湘边界行军时听说,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会议,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,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,制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。全军分成了三个方面军,向北挺进。不久,贺龙根据中央指示,将二军团、六军团等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,他任总指挥,任弼时为总政委。

1935年11月19日,红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向北开始长征。途经大庸时,先头部队歼灭了敌军一个团和一个民团,搭起浮桥准备渡河。这时,一架敌机飞了过来,战士们迅速隐蔽。敌机飞来飞去,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就飞走了。敌机飞走后,先头部队迅速渡河,可刚渡到河中间,三架敌机突然飞来,低空扫射,还投掷了12枚炸弹将浮桥炸断,炸死炸伤了不少战士。战士

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,拼死蹚过寒冷刺骨的河水,冲上对岸。

父亲的左腿被炸伤,鲜血染红了整条裤腿。他当时是部队的卫生员,懂得些救护知识,立即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大腿止血,然后被战友们用担架抬到卫生队。刚到卫生队,他就听到一个坏消息:连里动员一些伤员留下来当老百姓,其中有他。长征刚开始就负伤,还要被留下当老百姓,父亲痛苦万分,偷偷抹起了眼泪。他思来想去,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离开革命队伍,离开朝夕相处已经一年的亲密战友。坚决不离开部队!父亲暗下决心。他整天拖着伤腿跟在李明田连长身后软磨硬泡:“连长你放心吧,我这就是皮肉伤,几天就好。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,我不要担架抬,自己跟着部队走,如果走丢了,算我倒霉,行不行?连长你就带上我吧!”李明田连长很忙,哪有时间跟父亲磨牙,看父亲态度很坚决,又确实没伤到筋骨,就答应他了。父亲一瘸一拐地跟着卫生队边走边治疗,几天后,伤还没好就匆匆归队了。

过雪山草地,背着战友直到他停止呼吸

父亲说,长征最苦是过雪山草地。过雪山,大家穿的衣服很单薄,根本无法御寒。那时是6月,天很热,谁穿那么多的衣服干什么?上级也没有预料到要过雪山草地,根本没有准备。雪山上不但非常冷,而且空气稀薄,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不断有人得疟疾、发高烧、打摆子,许多战友冻死、病死在雪山上,成了后面的人的路标。

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走了足足有半个月。

草地很不好走,塔头甸子下面深褐色、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脚下去不知还能不能拔出来。人一陷进去,别人越拉,陷得越快,甚至拉的人也会被拽进去,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样死了不少人。

刚开始,部队还可以找到一些牧主的牛羊群,买来分给大家吃。后来牧主们有了经验,将牛羊群赶到红军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。父亲和战友们只能用身上带的一点点粮食和野菜煮在一起吃。过了几天,粮食吃光了,只好靠野菜充饥。后来,红三十二军又和他们会合,人多,吃的困难更大了。前面的人将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,后面的人只得吃树皮、草根,啃前面的人吃过的牛羊骨头,后来将自己身上的皮带也用火烧后煮烂了吃。

父亲有个战友——青年干事小王。他作战勇敢,多次负伤,因落下残疾,身体特别虚弱。过雪山时,父亲和通信员、司号员三人一直搀着他走,走着走着,

发现他呼吸困难,便鼓励他前进。又走了一小段路,他要坐下来休息,父亲听人说,雪山上不能坐下来休息——坐下就起不来了。他们三个就轮流背着他走,又累又饿,头昏眼花,还喘不上气,但他们不肯放弃,坚持要把战友背过雪山。他们坚信,只要过了雪山,小王就有救了。可他们当时毕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,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掉队了,离前面大部队越来越远,眼瞅着前面的部队开始下山了。这时,小王干事呼吸越来越急促,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耳边说:“李伢子,我不行了,放下我,你们快走,快走,一定要跟上部队!”父亲把他放下了。三个人实在背不动了,只好流着泪陪在他身边,直到他头垂下来,停止了呼吸。他们把小王干事的遗体抬到没人走过的地方,给他的脸上盖上一块麻布,摘下帽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,然后一步三回头地往雪山下走。到了山下,父亲惋惜地说,小王干事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该有多好啊!这成了我父亲一生的遗憾,他一想起来就老泪纵横。他非常怀念小王干事,怀念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。

长征胜利,坚决跟着共产党走

虽然铁索桥、腊子口已经被兄弟部队攻克,但是沿途还是有不少敌人的骑兵捣乱。红二方面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。几天的行军过后,传来一个好消息:六军团的十七师已经在理化与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师了。他们到了理化,受到了四方面军和当地藏族群众的热情欢迎,还收到了不少酥油糌粑和烧柴。藏族兄弟们举起双手,伸出大拇指头,嘴里念着“牙母、牙母”(很好的意思),让战士们住到他们的房子里去。四方面军还送来不少慰问品,有毛衣、毛袜、羊皮背心。父亲得到一件羊皮背心。父亲说,遗憾的是他们的部队晚到了一步,没有亲耳聆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。

1936年10月22日,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,行程16000里,转战湘、鄂、川、黔、滇、康、青、甘、宁、陕等省,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多次,终于在宁夏的兴隆镇和将台堡与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,胜利地结束了长征。

父亲讲长征故事时总会发出这样的议论:如果有人要问,红军为什么有这种牺牲精神?回答只有一个,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,不消灭蒋家王朝、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。连队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细,而且用地主、资产阶级剥削工农大众的事实教育战士们,激发了大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,使他们认识到,如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地主、资本家,穷人就不会有出路。

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,红军战士才能不论是过雪山草地,还是飞夺铁索桥、突破腊子口,都将困难、死亡置之度外。

红二方面军出发时共 2.1 万人,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 1.33 万余人。父亲常说他是幸运的。为了完成小王干事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的战友的遗愿,他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。长征精神激励了父亲一辈子。

(整理:张忠宇,2009 年 8 月)